

人口城市化驱动消费需求效应研究

田雪原

【提要】 从马克思再生产和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抽取和借鉴的一点是,在认定资本需求取决于人口、生活水平、资本技术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揭示5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一波三折产生的积累效应,阐发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对扩大消费总需求的决定性意义,立足于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决策选择。

【作者】 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近二三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消费增长缓慢,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国家通过增发国债、降息、开征利息税、增加低薪人员收入和连续大规模增加铁路、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办法拉动内需,收到一定成效;不过成效有限,均属政策调整范畴,继续下去风险也会随着增大,启动内需还应在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上寻求出路。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就是寻求的根本方略之一。

1. “二元经济”下拉动消费需求的基本动力

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时,曾科学地阐述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之间的关系。指出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即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而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又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两者互为前提性:生产为消费提供产品,消费使生产得以完成并为生产创造新的更多的需要,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开出摆脱危机“药方”——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资本需求由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三因素决定”论。他认为,在资本技术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生活水平不能有足够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到了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刘易斯将研究领域推进到发展中国家,探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和现代部门的就业,提出“二元经济模型”(W. A. Lewis, 1954),大大推动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和人力资本的研究。这些研究给探讨中国“二元经济”下的人口变动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启迪,表明资本需求不仅取决于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三要素”,而且受制于特定的人口城乡结构。先进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和消费上表现出很大差异,因而对于社会总需求而言,人口城市化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扩大内需的基本拉动力。

社会消费总需求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需求、全体居民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两部分,任何一部分都同人口城市化相关联。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

需求,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同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联。依中国情况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力度不断加大,然而迄今为止,依靠基本建设投资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仍旧扮演主角,城市又是基建投资的主战场。按照国家统计局 16 大行业的划分,仅有农、林、牧、渔业投资基本投向农村,另有地质勘探、水利管理、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业可谓城乡兼顾,而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 10 多个行业基本属于面向城市的行业。多年来,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针指导下,农、林、牧、渔基本建设投资有不少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 年比 1985 年增长 3.7 倍,但是占当年全部基建投资的比例仅由 1.6% 提高到 1.9%,升高 0.3 个百分点。1998 年农、林、牧、渔业加上地质水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文艺和广电业投资的一半(假定后 3 种行业农村占投资的一半),共计 842 亿元,也仅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 11916.7 亿元的 7.1%^①。再以能源消费为例,1997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138 173 万吨标准煤,其中农、林、牧、渔、水利业消费 5 905 万吨,仅占 4.3%;而工业一项即消费 100 080 万吨,占到 72.4%^②。可见当前作为拉动内需强有力杠杆的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各种行业;能源等生产资料消费,主要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如能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城市建设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则可吸引更多的建设投资,提供广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费场所,起到有力拉动内需的作用。

不过通过基建投资扩大再生产和增加生产性消费,要做具体的分析,力戒盲目性。过去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的主导矛盾是供不应求,社会表现为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经历 20 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软着陆”之后,短缺经济已从根本上改观,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作为最终产品的生活资料消费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只能以市场为座标,只有市场现实的需求才真正成为扩大消费的动力。那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企图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消费的做法,弄不好走到高耗、低效、重复建设的老路上去,非但达不到扩大消费总需求的目的,从长远看,还会危及到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给经济发展留下隐患,因而是不可取的。生活资料的需求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它从根本上制约着生产性消费需求,是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症结所在。拉动内需,要在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突破,加快人口城市化是可供选择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口。

生活资料消费的主体是个人消费,个人消费是人口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依据个人消费满足的程度,区分为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更富裕几个阶段。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并接近小康阶段,不过在空间上表现出很大差异。东部地区基本上实现小康,西部地区则处在向小康过渡,少数边远地区尚处在向温饱过渡阶段。空间分布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城乡之间,对现状似可作出这样的估断:总体上城市已完成向小康阶段的过渡,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已开始步入富裕阶段,城乡之间消费差距拉大,表现出“二元经济”明显的“消费阶梯”。远者且不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消费阶梯”的形成已经筑成相当的基础(见表 1)。

表 1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按照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393.1%,而且农村居民提高的速度略快于城镇居民。分时期来看,由于改革由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上升很快,按当年价格计算,1985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 397.6 元,消费上升到 347 元,使城乡居民消费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1)由 1978 年的 2.9 下降到

①② 《中国统计年鉴 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

2.3,大大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差距。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启动力度加大,刺激城市经济增长;农村以土地政策为主改革的威力释放殆尽,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导致城乡消费比逐步攀升,至80年代末回升到改革前的水平。90年代前期城市改革步骤加快,国民经济“过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消费比一直推升到1994年的3.5,创下新高。90年代中期治理经济“过热”取得成效。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城乡居民消费比一度下降较快,1996、1997年下降到3.1。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7%~8%的较高速度,1998年城乡居民消费比重又回升至3.3。1999年受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薪,城镇低收入人员最低水平线提高影响,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消费比有可能再创新高。如此,拉动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消费需求出路在哪里,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笔者以为,有3种出路选择:

表1 1978~199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元

年份	全国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消费比 (农民=1)
1978	184	138	405	2.9
1980	236	178	496	2.8
1985	437	347	802	2.3
1987	550	417	1 089	2.6
1988	693	508	1 431	2.8
1989	762	553	1 568	2.8
1990	803	571	1 686	3.0
1991	896	621	1 925	3.1
1992	1 070	718	2 356	3.3
1993	1 331	855	3 027	3.5
1994	1 946	1 118	3 891	3.5
1995	2 236	1 434	4 874	3.4
1996	2 641	1 768	5 430	3.1
1997	2 834	1 876	5 796	3.1
1998	2 972	1 895	6 183	3.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第一,重点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出路选择。目前中国农村居民占到总人口的近70%,如能有效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自然再好不过、再简单不过了。问题在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收入的提高,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两率”的提高不仅受到资本技术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限制,而且在根本上受到人口多、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不足的限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依靠政策、投入、科技进步等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需另辟新路,尤其是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和附属人口转移出去。

第二,重点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决策选择,包括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人数的扩大。水平的提高自不待言,现在的情况是城乡居民消费比已经升得很高,继续升高的经济、社会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扩大城市居民消费者人数产生的效益是十分巨大的。以1998年城市居民平均消费6 183元(比农村高出4 288元)计算,如果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由占总人口30.4%增加到31.4%,即1 248万人,则可净增加消费535.1亿元,其拉动消费需求动力何等之大!

第三,加快人口城市化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比相结合的决策选择。上面第一种重点在农村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比的选择,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的向外转移,人口城市化是其重要的分流渠道;第二种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决策选择,基本的落脚点也只能建立在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上。反过来说,加快人口城市化既可以有效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又能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向外转移,从而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商品化率、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开辟道路,收到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比实效。人口城市化具有使城市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轮番上升、相互促进的功效,是当前扩大内需强有力的动力和杠杆。

2. 中国人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积累效应

落后“二元经济”下人口城市化拉动消费需求的原动力作用,是一个无争的事实。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人口城市化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历史。当然,这种“带动”也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基础之上,确切地说,是城市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三者互相促进的历史。50 年发展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城市化进展顺利,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就比较快,增长也比较迅速;什么时候城市化进展迟缓,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就比较缓慢。50 年来中国人口城市化走过的历程,可粗略划分成 50 年代较快发展、60 至 70 年代中期徘徊不前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城市化水平对居民消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依稀可见的。

50 年代较快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按照统计数据可持续到 1960 年,但笔者以为,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受“共产风”、压缩城镇人口、干部下放等同城乡人口变动有关因素影响,1959 年和 1960 年的城镇人口有商榷之处,故截止到 1958 年。由于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国,1950 年当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达 29.7%、发达国家已达 54.9% 之时,中国仅为 11.2%^①。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很快,到 1958 年上升到 16.3%。居民消费水平也增长很快,按可比价格计算,1958 年比 1952 年增长 38.2%,年平均增长 5.5%,与同期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 7.0% 相对应(见表 2)。

表 2 1952~1958 年人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	万人	%	元	指数
1952	57 482	7 163	12.5	50 319	87.5	76	100.0
1953	58 796	7 826	13.3	50 970	86.7	87	107.7
1954	60 266	8 249	13.7	52 017	86.3	89	108.2
1955	61 465	8 285	13.5	53 180	86.5	94	115.1
1956	62 828	9 185	14.6	53 643	85.4	99	120.0
1957	64 653	9 949	15.4	54 704	84.6	102	122.9
1958	65 994	10 721	16.3	55 273	83.8	105	124.6

注:居民消费绝对数为当年价格,指数以 1952 年为 100 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

60 至 70 年代中期徘徊时期。除 1959、1960 年情况比较特殊难以确定外,城市人口比例从 1961 年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 1974 年;其后稍有回升,至 1978 年回升到 17.9%,相当于 50 年代末的水平,结束 20 年徘徊局面。1958~1978 年城镇人口由 10 721 万增加到 17 245 万,年平均增长 2.4%,大大低于 1952~1958 年年平均增长 7.0% 水平。同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也降至 2.5%,比 1952~1958 年平均增长 5.5% 落后一大截(见表 3)。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时期。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展史上新的一页,也为人口城市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迎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20 年来城镇人口增加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1996, New York, 1998.

表3 1958~1978年人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	万人	%	元	指数
1958	65 994	10 721	16.3	55 273	83.8	105	124.6
1961	65 859	12 707	19.3	53 152	80.7	114	99.4
1965	72 538	13 045	18.0	59 493	82.0	125	132.7
1968	78 534	13 838	17.6	64 696	82.4	132	137.8
1970	82 992	14 424	17.4	68 568	82.7	140	147.3
1975	92 420	16 030	17.3	76 390	82.7	158	163.8
1978	96 259	17 245	17.9	79 014	82.1	175	177.0

注:居民消费绝对数按当年价格,指数以1952年为100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表4 1978~1998年人口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增长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居民消费水平	
		万人	%	万人	%	元	指数
1978	96 259	17 245	17.9	79 014	82.1	175	177.0
1980	98 705	19 140	19.4	79 565	80.6	227	206.7
1985	105 851	25 094	23.7	80 757	76.3	406	313.7
1988	111 026	28 661	25.8	82 365	74.2	643	371.5
1990	114 333	30 191	26.4	84 142	73.6	803	391.2
1995	121 121	35 174	29.0	85 947	71.0	2 236	580.0
1998	124 810	37 942	30.4	86 868	69.6	2 972	695.8

注:居民消费绝对数为当年价格,指数以1952年为100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20 697万,年平均增长4.0%,比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快许多。同期居民消费水平由175元增加到2 972元,按可比价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1%,(见表4)。

对于中国目前30.4%城镇人口比例的城市化水平作何评价,学术界认为这一比例偏高者有之,偏低者亦有之,可谓见智见仁。笔者以为,“三七开”大致反映了人口城乡结构现实,然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共同认为,与1998年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高达75%、世界45%和发展中国家38%比较起来^①,我们太落后了。问题出在哪里?主要出在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徘徊不前。如果这一时期不是徘徊不前,而是像最近20年保持城镇人口4%的年平均增长率,以1958年城镇人口10 721万为基期,1998年可增加到51 472万,可占当年总人口的41.2%,即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现实的30.4%与有可能达到的41.2%之间10.8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就本文拉动内需主题而言,意味着1998年一年损失掉4 021亿元的居

^① UNFPA. Natis Sadik: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 New York, 1998.

民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 36 921.1 亿元的 10.9%。1998 年一年如此,自 1958 年以来 40 年失掉的居民消费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人口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消费需求来说具有累进的性质。同样,人口城市化的停滞不前也会对消费需求的衰减产生积累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低水平严重阻碍着消费需求的扩大,加速人口城市化理应成为启动内需的首要战略选择。

3. 加速人口城市化的宏观决策选择

人口城市化系指人口向城市地带集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升高过程。不过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差异,人口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当今发达国家在基本完成乡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之后,正经历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阶段,并伴随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转移“回归”,笔者称之为“后城市化”阶段。中国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现阶段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即“前城市化”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多,包括城市分布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第二阶段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甚至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后城市化”也相伴发生,中国人口城市化将呈立体推进态势。然而不要忘记,落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城市化,第一阶段乡村人口向以中小城镇为主的转移具有决定的意义,现阶段的战略决策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点上。

按照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农村富余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确定:农村“推力”,从而向外转移人口数量;城镇“拉力”,从而吸纳转入人口数量。农村富余人口的核心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当前数量多少众说纷纭。1994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当时农村富余劳动力 1 亿多,2000 年将增加到 2 亿左右。城镇吸纳转入人口数量参照 50 年城市化历史经验数据,可以 1958~1978 年人口城市化徘徊时期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 2.4% 为下限,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时期年平均增长 4.0% 为上限,而以改革开放近 10 年来年平均增长 2.8% 的相对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中值进行预测。其中的中位预测如表 5 所示。

表 5 人口城市化预测(中位)的 1988~1998 年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既是积极的,高于 1958~1978 年平均 2.4% 增长速度 0.4

表 5 1998~2030 年人口城市化预测(中位) 万人

年份	总人口	城镇人口数量	城镇人口 (%)	城镇年自增人口	城镇年吸纳人口
1998	124 810	37 942	30.4		
2000	127 756	40 096	31.4	305	722
2010	137 292	52 849	38.5	247	1 028
2020	145 448	69 658	47.9	215	1 466
2030	149 594	91 812	61.4	141	2 075

注:本预测总人口根据 U. 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城镇人口按 1988~1998 年平均增长 2.8% 外推; 城镇年自增人口按 1998~2000 年平均增长 0.8%, 2000~2010 年平均增长 0.6%, 2010~2020 年平均增长 0.4%, 2020~2030 年平均增长 0.2% 计算; 城镇年吸纳人口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平均数。

于 1958~1978 年平均 2.4% 增长速度 0.4 个百分点,体现加快城市化要求;也是比较实际的,低于 1978~1998 年平均 4.0% 增长速度 1.2 个百分点,是近 10 年城镇人口增长速度的外推。只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正常增长速度,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如此可在 2030 年达到世界人口城市化一般水平,即用 20 年时间消除过去 20 年徘徊不前造成的差距。

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主要困难在于:即使城市具有足够的“拉力”保证上述城市化速度兑现,也远远小于农村的“推力”,不能解决全部或大部农村富余人口问题。前已叙及,目前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 2 亿,加上老年和少年附属人口至少在 3 亿以上;

上述预测近 10 年内只能吸纳 1 亿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必须另辟蹊径。笔者仍坚持以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为基本立足点,实行“三三制”、“截流”与“分流”相结合的一贯主张。即:

第一,向广义农业转移 1/3 的“源头截流”。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栽培种植业,而广义农业资源中,耕地仅占土地资源面积的 10%,可利用草地占 32.6%,森林占 13.9%,内陆水域占 1.8%,其余荒山、荒地、沙漠、沼泽等占 41.7%,具备发展林、牧、渔业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转移农村现有 1/3 的富余劳动力和人口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向乡镇企业转移 1/3 的“分流”。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支生力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乡镇企业面临技术改造、资产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新机遇,如能引导适当集中,既可发挥聚集效应,又可以全国 1.91 万个镇和 2.64 万个乡为据点,通过产业升级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吸纳 1/3 是做得到的。

第三,向城镇转移 1/3 的“分流”。上述预测方案表明,城镇具备这一能力,关键在于政策。中国以中小城镇吸纳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无疑适合中国的国情,基本做法仍需坚持,仅仅注重城市经济效益的重大轻小主张不足取。但是必须考虑的,一是 21 世纪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新技术革命,由于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取得的新的突破而拉开序幕,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大、中、小城市格局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化,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加快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是人口和城市地区分布不平衡,东南沿海密集,西北广大腹地稀疏,城市化方针和政策不应“一刀切”;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地区差距拉大,城市化方针和政策应当适应经济发展作出相应调整。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在坚持原有城市化方针基础上,增加必要的弹性,适当放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限制,因地制宜地解决大、中、小城市的合理结构。

参 考 文 献

1. 联合国 1992 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文献:《21 世纪议程》,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年。
2.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年。
3. 季羨林等:《21 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 年。
4. 郑新立主编:《迈向 2020 年的中国》,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 年。
5. 彭松建主编:《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6. 《田雪原文集》、《田雪原文集》(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年、1995 年。
7. 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二版),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 年。
8. 田雪原主编、蔡昉副主编:《人口大国城市化之路》,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 年。
9. J. M. Keynes (1973), *Works of Lord J. M. Keynes*, Vol. 14.
10. W. A. Lewis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22.
11. G. S. Becker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 United Nations (1995),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1994 Revision*, New York.

(本文责任编辑: 朱 萍)